

以救贖為名的政治暴力與記憶政治： 讀《有些人需要殺戮：在我的國家的謀殺回憶錄》

賴奕諭

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透過回顧菲律賓記者派翠西亞·伊凡吉莉絲塔於 2023 年出版的回憶錄《有些人需要殺戮》(2023) 一書，檢視菲律賓在前總統杜特蒂政權反毒戰爭影響下的政治效應，以及因為暴力所形塑而來的社會關係與條件如何回應當前菲律賓社會對於記憶、歷史及其詮釋權的討論。同時，本文透過比較其他相關作品的視野，試圖將回憶錄中所呈現的個案放回到菲律賓政治暴力的發展脈絡中。這樣的比較分析旨在凸顯菲律賓在政治暴力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課題，並嘗試指出在這樣的基礎上還能再有哪些未來可以持續關注的方向。

關鍵字

菲律賓、杜特蒂、政治暴力、反毒戰爭、記憶政治

壹、引言

記憶、歷史及其詮釋權，這些是菲律賓近年來討論政治時方興未艾的重要議題。菲律賓記者派翠西亞·伊凡吉莉絲塔 (Patricia Evangelista) 藉由其回憶錄《有些人需要殺戮》的書寫，回顧了前總統羅德里戈·杜特蒂 (Rodrigo Duterte) 執政期間 (2016–2022) 所推行的反毒戰爭，帶領讀者檢視菲律賓的政治暴力現象是如何鑲嵌於前述的討論課題之中。作者更以其過往調查報導的

素材為基礎，試圖解釋菲國民眾為何得以接受前總統杜特蒂所掀起的「法外處決」(extrajudicial killings) 浪潮，並接著以相應的政治選擇於 2022 年讓前獨裁總統之子小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 當選為總統，而杜特蒂的女兒莎拉·杜特蒂(Sara Duterte) 則為其副手。有鑑於此，本書可被視為是理解當前菲律賓政治情勢的一時之選。

然而，當反毒戰爭與法外處決作為菲律賓具有高度爭議性的課題時，本書的出版也應當同時被理解為不同行動者在爭奪詮釋權的過程中所出現的產物。尤其作者在調查反毒戰爭期間所任職的菲律賓網路媒體「拉普勒」(Rappler)，被視為是親美且反杜特蒂政權的一家新聞媒體公司，這使得其寫作所反映出來的視角揭瘡了文化相對主義和普遍人權概念之間的緊張關係。特別當這本書選擇於 2023 年在美國出版之後，旋即為《紐約時報》選入 2023 年度十大好書，《時代》雜誌也將其放入 2023 年度必讀百大書單，這些「殊榮」除了更是凸顯這樣的緊張關係之外，甚至還可能牽涉到前殖民母國與殖民地關係這樣政治敏感的課題。

本文首先將分析這本回憶錄的行文架構與內容，指出作者是如何透過其個人經歷與家族歷史的交互影響，將其調查報導反毒戰爭的素材放入到菲律賓政治發展史的脈絡中，包括它是如何呼應近來菲國社會關於記憶政治的討論。在過去幾年裡，因為菲律賓反毒戰爭而出現的個人書寫、媒體報導、人權報告與學術著作多如牛毛。也因此，本文將嘗試定位本書與其他相關作品之間的關係，指出它是凸顯了哪些在人權和政治暴力研究之中的重要研究面向，以及在這樣的基礎上還能再有哪些未來可以持續關注的方向。

貳、殺戮、安魂與纏繞於其中的記憶

本書分為「記憶」、「殺戮」與「安魂」三個主要部分。伊凡吉莉絲塔在開頭描述了她以一名記者的身分遇見了在反毒戰爭中倖存下來的小女孩愛愛(Love-Love)的經歷。當時正值杜特蒂剛上任總統之際，作者在反毒戰爭初期遇見了許多像愛愛一樣的年輕女孩：有些人不得不承受失去至親後的創傷和生存壓力，有些人甚至不幸在過程中被誤傷致死。透過她們的相遇，作者開始述說自己同樣作為一名菲律賓女性的成長經歷。她在 1985 年，也就是人

民力量革命爆發的幾個月前出生。當年的那場革命成功推翻了前總統老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Sr.）政權，也讓許多人曾樂觀的相信著，屬於菲律賓的自由民主新時代即將到來。於是就在這樣的成長背景之下，作者透過第一部分「記憶」的第一章至第五章，講述她是如何藉由成為一個報導災難和創傷的記者，一路漸漸意識到菲律賓內部的問題與人民的不滿，最後見證了杜特蒂因而崛起的過程，還有反毒戰爭緊接著帶來的衝擊與影響。

伊凡吉莉絲塔在第二章〈倖存的多數〉中，先是提到了她的祖父及其於 1951 年出版的《斐迪南·麥哲倫的冒險》（*The Fredding of Ferdinand Magellan*）一書，內容講述麥哲倫於 16 世紀造訪菲律賓群島的奇聞軼事，包括他自己額外再延伸想像的情節。「沒有讀者會因此錯把我的祖父當作歷史學家」她說。「但他對西班牙征服者首次航向菲律賓的描述，確實與事實有所關聯。」（Evangelista, 2023: 19）最初在乍讀到這個段落的時候，我總覺得有些突兀。不過其實再仔細端倪她的祖父、家族成員和她自己在書中的現身，對於理解作者寫作這本回憶錄的策略，並思考記憶和歷史之間的關係卻是相當關鍵的。

在書中，作者對反毒戰爭的調查報導主要來自事後的追溯。由於她難以親身目睹案發現場，她必須仰賴目擊者、倖存者、受難者親友、警方、調查報告等各式各樣的訊息來源還原事件現場。當她談及人民力量革命與其自身的關聯時，她強調這並非是要記錄歷史，而是為了闡明她在自我認識與投身記者行業的過程，人民力量革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Evangelista, 2023: 32）。畢竟人民力量革命並不是屬於她的革命，但它卻提供了她理解菲律賓社會的素材，使她得以將自己和自己的行動安放在一個敘事框架裡。

只不過有些時候，人們的敘事內容不見得會是一致的邏輯，甚至可能有相互矛盾的情況。就好比她的祖父雖然曾於老馬可仕執政期間入獄服刑過，但他卻在老馬可仕政權倒台之後，同一群藝文工作者在支持老馬可仕的宣言上連署簽字。直到祖父過世之後才發現這件事的伊凡吉莉絲塔，透過親友及各種管道嘗試理解祖父當年為何做出這樣的決定，卻始終無法得到合乎邏輯的解答。於是，在探尋原因而繞了一大圈的最後，伊凡吉莉絲塔這麼為祖父的故事作結：

「我沒有經歷過獨裁統治，不過他所做的決定卻使他能夠生存，更構成了我得以受教育與成長的特權。」（Evangelista, 2023: 37）畢竟，活下來的人才能有繼續說故事的機會。

有鑑於此，即便反毒戰爭在杜特蒂執政下的菲國社會是現在進行式，作者認為她所搜集來的目擊證詞、口述經驗等都不能夠簡單被視為只是為了要重構真相的素材，更重要的是要探究發聲者如何藉此思考自己與反毒戰爭之間的關係，而他們又該如何讓自己在遭逢這些殺戮之後繼續生存下去。也因此，伊凡吉莉絲塔的這本回憶錄相當重視不同立場的行動者有意或無意強調的用詞遣字。

在第二部分〈殺戮〉的第六至第十二章，暴力的語言（languages of violence）可說是伊凡吉莉絲塔安排後續章節結構的重要指引。她首先在第六章透過「救贖」（salvation）的概念，指出受難親友是如何藉此接受亡者因法外處決而逝世的結果。因為反毒戰爭是為了拯救菲律賓人民脫離毒品控制的舉措，這樣的邏輯使得涉毒者不被認為是遭到謀害，他們的死去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具有宗教意涵的救贖。作者甚至特別指出，杜特蒂基本上從未使用過「謀殺」（murder）這個詞彙，而是不斷強調這是他對涉毒者所發起的戰爭（Evangelista, 2023: 145-147）。也是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她在第七章〈如何辨別成癮者〉和第八章〈如何殺掉成癮者〉鉅細彌遺的解釋菲律賓刑法、警察和法院的守則，並說明反毒戰爭的法外處決是如何在種種的定義和規範之中避開「違法」的可能性。尤其當他們在檯面上持續強調執行法外處決的私刑隊並未接受國家的資助時，這樣的說法更是能夠為官方省去不少麻煩。

她從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分別藉由警官、私刑隊成員和受害者家屬與她互動的過程做為切入點，嘗試勾勒出這些行動者無法輕易以非黑即白來定義的輪廓。除了前述的「救贖」觀點之外，加害者往往在合理化其暴力使用的過程，強調那是為了下一個世代的必要手段，反映出他們對於菲律賓社會未來該是如何的想像。於第十章受訪的私刑隊成員西蒙便表示，即便自己從未在行動期間真正獲取報酬，他卻會願意為了自己孩子的未來而參與其中（Evangelista, 2023: 240）。當然，這並不表示作者便輕易地接受了加害者的觀點，她反而是

在這些篇章同時強調，這些說詞或是文字遊戲所建構出來的意義體系往往武斷且相當不穩定。

其中一個曾經造成媒體熱議不斷的例子，是在第十章開頭的南韓商人遭警察綁架撕票案。當時警方以假造的逮捕令，指控該商人涉嫌毒品犯罪，並將其擄入警察總部。接著，警方甚至在不願透露其生死的情況之下，向其妻子要求高額贖金。由於此事最後造成南韓政府及僑民的高度關注，使其一度成為兩國之間的外交危機。也因此，這是在反毒戰爭開始七個月之後，杜特蒂首次公開承認警察以反毒為藉口而犯下的罪行（Evangelista, 2023: 229）。另一個例證是作為第十一章主軸的賈斯汀（Djastin）案。作為菲國申訴專員辦公室（Office of the Ombudsman）第一個認證警方藉反毒戰爭犯下謀殺罪的案例，伊凡吉莉絲塔藉此說明反毒戰爭的種種不透明流程，還有當家屬嘗試要查明真相的時候所顯露的各種漏洞（Evangelista, 2023: 274）。至於第十二章的案例，雖然是個因個人財產爭議而起的警察殺人案，不過因為是在杜特蒂反毒戰爭期間發生的警察濫權事件，這便迫使菲國政府得出面聲明這只不過是獨立的個案，不該藉此類推至與反毒戰爭相關的討論（Evangelista, 2023: 308）。

有別於官方不斷主張反毒戰爭的法外處決往往與警方無關，伊凡吉莉絲塔在這裡嘗試表明警方在過程中所涉入的情形。此外，就算並非反毒戰爭的例子，她也說明了警察濫權的例子是如何成為人們得以批判法外處決的素材，使得杜特蒂政權「合法化」反毒戰爭的各種說詞得以持續受到挑戰。她也在第二部分的最後強調，真相或許會被官方的謊言給掩蓋，這並不表示我們將無法知悉真相，只不過可能是在這個當下無法了解真相而已（Evangelista, 2023: 314）。畢竟在她看來，存活下來的多數人還是有機會得以揭露真相。

順著這樣的邏輯，第三部分的〈安魂〉主張反毒戰爭所建構而來的意義體系並非鋪天蓋地的使所有人都信服，也呈現了伊凡吉莉絲塔自己是如何看待反毒戰爭發生之後的未來。她在書中追蹤了數位曾在 2016 年總統大選投票給杜特蒂的支持者。不少她筆下的主角都從本來堅信杜特蒂能夠帶來更好的未來，一直到藉由看見反毒戰爭的駭人照片、影片，還有他們在過去幾年所經歷的各種政治事件開始漸漸覺醒，進而憑藉著罪惡感所帶來的動力而開始行動。

與此同時，伊凡吉莉絲塔在本書的終章寫到自己於人民力量革命 36 週年紀念日那天回到乙沙大道（EDSA Avenue）的經歷，而那正好就是菲律賓 2022 年總統大選的前夕。她表示，杜特蒂在就任總統之後便從未出席過人民力量革命的紀念活動。小馬可仕更是在那之後的幾個月，帶著父親的政治遺產坐上了總統的位置。小馬可仕勝選的時刻，其支持者紛紛湧入乙沙大道，表示他們總算是奪回了這個空間。因為反毒戰爭造成的死亡在這裡可能不再重要，畢竟這是活下來的多數人所做出的選擇。而伊凡吉莉絲塔的記錄和書寫在她自己看來，則是一種讓記憶得以延續的途徑。

參、菲律賓、政治暴力與法外處決：比較的觀點

在杜特蒂的反毒戰爭受到關注之前，政治暴力與法外處決在菲律賓就已經是重要的社會現象與研究課題。在這些討論中，反毒政策或行動時常會被視為是一種政治工具，讓政客以此合法化其政治暴力手段，使其得以在選舉中取得勝利。然而，研究毒品議題的菲律賓人類學家 Gideon Lasco（2021: 1-2）卻也強調，將毒品視為是政治工具的觀點，容易使人忽略為什麼反毒讓菲律賓人民相信這是必要之惡。在同一本書裡，菲律賓裔記者 Sheila Coronel（2021: xi）也於序言中主張，菲律賓社會往往將毒品、貧窮和犯罪給連結在一起，成為人們為反毒戰爭辯駁的理由，卻也使其最後成為懲罰窮人的手段之一。他們的立場其實都與伊凡吉莉絲塔提到的「救贖」觀點相互呼應，不禁使我聯想到人類學家 Alexander Laban Hinton 的經典作品 *Why Did They Kill? Cambodia in the Shadow of Genocide*（2005）。該部作品便嘗試透過加害者的視角，闡述他們如何將赤柬的議題還有柬埔寨的文化和宗教觀拼貼、整合成一套論述，藉此來合理化他們當年大規模的屠殺。而透過菲律賓反毒戰爭的例子，我們能夠看到的不只是論述的形成過程；縱使法外處決看似是無差別的政治暴力形式，我們也得以同時看見有哪些群體在這個過程中更容易遭受此般暴力形式的影響。

當然，政治暴力和非法處決不是僅在討論反毒議題時才會出現的問題。菲律賓政治暴力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美國殖民時期，當時的政治人物開始透過非正式的準軍事組織（paramilitary）來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和戰前的社會秩序。尤其是當他們是以鎮壓叛亂為名在行動的時候，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線變得模

糊，而法外暴力在菲律賓逐漸被正常化，甚至成為後來寡頭政治的發展基礎（Anderson, 1988: 14-15）。自 1946 年菲律賓獨立以來，許多地方政客利用二戰期間持有的武裝力量，組建私人軍隊，這樣延續的情形進一步塑造了菲國近代政治的暴力特徵。其中有些人便以對抗國內共產叛亂勢力為由，既透過私人武裝勢力鞏固地方選舉結果，並影響全國選舉情勢。這樣的說詞不僅在冷戰期間為國際社會所支持，即使被視為自由派的民主勢力也往往默許了這些私人武裝的存在。在這樣的脈絡之下，菲律賓民眾的評斷可能不在於是否發生了暴力，而更在於政府為何施行暴力，以及受害者是否被歸類為他們認為該被處理的對象。

有鑑於此，當我們閱讀伊凡吉莉絲塔的回憶錄，尤其是聚焦於菲律賓反毒戰爭中的法外處決事件時，我們必須意識到，反毒只是其中一種被用來「打擊犯罪」的藉口。儘管這些行動都是法外處決，但暴力的對象和目標可能因時間和地點而有所不同，而合理化這些暴力行為的論述也會有所差異。然而，這些差異不應被視為彼此獨立且毫無關聯。從政治暴力的技術角度來看，菲律賓的法外處決通常伴隨著將屍體展示和後續的媒體曝光。這樣的組合使得法外處決更具體地成為一種示範性暴力（*exemplary violence*），這種暴力形式旨在影響和威嚇民眾（McCoy, 2021; Rafael, 2022）。因此，《有些人需要殺戮》一書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參照點，讓讀者能夠進一步思考菲律賓政治暴力技術在不同時空中的相互影響、發展和演變。這也使我們能夠更細緻地理解這些暴力手段對不同社會群體的具體影響，以及這些群體如何應對這些手段。

此外，伊凡吉莉絲塔在書中針對合理化反毒戰爭論述的挑戰，除了揭露菲律賓法外處決不同行動者所造就而成的複雜性與不穩定性，也提供了讀者重新反思理解這類「國家暴力」的方式。簡單來說，警察這樣的行動者作為反毒戰爭中不可或缺的要角，其行為舉止不見得完全服膺於國家規範下的準則。換言之，在理解國家暴力的時候，我們既不能將國家視為單一同質的實體，又或是假定能夠用單一邏輯理解國家暴力的運作。Coronel（2017）的政治暴力研究支持了這樣的觀點。她在文章中解構了警察在杜特蒂政權期間的法外處決所扮演的角色，主張警察實際上是將殺戮作為一門生意。在國家暴力的外殼之下，

警察往往被視為是政府用以政治控制的工具。在這樣的情況下，警察個人的能動性、不當行為以及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便會被忽略，這也是成就反毒戰爭的重要一環。

如此看來，光是藉由探討警察在反毒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便使得我們能夠更加理解反毒戰爭作為國家暴力的複雜本質。更不用說，伊凡吉莉絲塔將私刑隊成員等加害者納入討論，這更是進一步擴展了我們對於暴力如何構建菲律賓社會關係的理解。儘管書中未有特別突顯這一點，但我們必須注意到許多加害者與受害者及其家人是鄰居，這將直接影響人們在討論反毒戰爭及其相關記憶時的內容和方式，因為他們很可能仍需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區中。當伊凡吉莉絲塔強調自己絕大多數關於反毒戰爭的調查材料是通過這些人的訪談獲得的時候，這種透過暴力所塑造出的社會關係便值得我們更仔細地關注和審視。

類似的例子可以在 Argenti-Pillen (2002) 對斯里蘭卡的研究中找到。Argenti-Pillen (2002: 198-199) 指出，在斯里蘭卡的農村地區，居民常常通過模稜兩可的暴力描述和解釋來避免與同住社區的政治暴力加害者發生衝突。這種策略雖然有助於防止地方衝突進一步惡化並擴散到其他地區，但也使加害者忽視自身的問題，從而促使暴力行為的持續。考慮到這個研究案例帶來的啟示，我認為伊凡吉莉絲塔在書中對於「救贖」概念的討論應更具體地放置在發聲者所處的社會關係脈絡中。否則，讀者可能會錯誤地將這樣的論述視為文化上的解釋，而忽略了發聲者在評估自身處境時所做出的積極行動。

近年來，隨著杜特蒂和小馬可仕的相繼崛起，許多異議人士紛紛高聲呼籲菲律賓人民不應忘記歷史的教訓。在這些討論之中，人們往往將老馬可仕、杜特蒂和小馬可仕連結在一塊，強調後繼者是如何繼承前者的政治遺產，這也是為何記憶和歷史得以成為當代菲律賓社會重要的競逐場域。一方面，許多人認為年輕一代對於戒嚴時期的歷史知之甚少，才導致了這樣的選舉結果。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斷強調小馬可仕及其家人一直試圖修正歷史，使菲律賓人相信戒嚴時期是菲律賓的黃金時代。這些年來，許多社運人士和戒嚴受難者的經歷和見證透過演講、影像、詩歌、散文、小說和回憶錄等媒介在菲律賓社會中廣泛流傳。特別是在小馬可仕參選總統的大選前夕，許多人免費將自己的作品在社

交媒體上廣泛分享，希望能夠影響觀眾的投票意向。這種趨勢在伊凡吉莉絲塔的回憶錄中得以清晰展現，尤其是在第三部分的結尾處，她不斷強調菲律賓人民遺忘了什麼，以及人們應該努力保留哪些記憶。

然而，我認為這樣的討論方式將菲律賓的記憶政治議題談得過於扁平，這也是我對伊凡吉莉絲塔的回憶錄結尾感到最為可惜的地方。雖然老馬可仕和杜特蒂在政治表現上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他們的政治暴力手段其實略有差異，這不僅影響了透過暴力而形塑出來的社會關係和條件，也同樣影響人們對暴力與記憶的表達方式。也因此，在我看來，對於記憶政治的討論不應僅停留在記得與遺忘這種二分的框架，而應將前述的社會關係一同納入考量。

根據 McCoy (2021: 63-64) 對政治暴力的研究及比較，他指出，在治理手法上，老馬可仕更傾向於監禁異議份子，並於戒嚴期間為了要壟斷暴力曾下令解散菲律賓各地眾多的私人武裝。因此，許多異議者在出獄後得以以自己的經歷為基礎持續地發聲。相對而言，在杜特蒂的統治下，受害者往往直接被殺害，失去了自我辯駁的機會 (Rafael, 2022: 98-100)。而能夠講述杜特蒂政權底下反毒戰爭經驗的人，多半是伊凡吉莉絲塔筆下那些「活下來的多數人」。伊凡吉莉絲塔當然在書中有約略處理到這些人為求自保可能採取的生存策略，但她未能在最後討論記憶政治時，將這樣的面向更細緻地呈現出來。

總的來說，《有些人需要殺戮》雖然並非學術著作，但伊凡吉莉絲塔透過多年的反毒戰爭調查報導，成功突顯了一些菲律賓重要的政治暴力研究議題。這些議題涵蓋了法外處決機制的形成、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共謀所形成的反毒戰爭解釋框架與論述、在國家暴力外衣下不同行動者呈現的複雜性，以及政治暴力是如何形塑得以左右記憶政治的社會關係與條件。然而，藉由本文的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到本書以反毒戰爭為個案討論的局限性，必須將其放在更具體的政治暴力發展脈絡作出比較，才得以更細膩地釐清暴力對菲律賓社會與人群的影響與後續政治效應。

引用文獻

- Anderson, Benedict. 1988. "Cacique Democracy in the Philippines: Origins and Dreams." *New Left Review* 169: 3-31.
- Argenti-Pillen, Alex. 2002. *Masking Terror: How Women Contain Violence in Southern Sri Lank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Coronel, Sheila. 2017. "Murder as Enterprise: Police Profiteering in Duterte's War on Drugs." In Curato, Nicole Ed. *A Duterte Reader: Critical Essays on Rodrigo Duterte's Early Presidency: 167-198*.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 Coronel, Sheila. 2021. "Foreword: In the Fog of the Wrong War." In Lasco, Gideon ed. *Drugs and Philippine Society: IX-XII*. Quezon City: Bughaw.
- Evangelista, Patricia. 2023. *Some People Need Killing: A Memoir of Murder in My Country*. New York: Penguin Random House.
- Hinton, Alexander Laban. 2005. *Why Did They Kill? Cambodia in the Shadow of Genocid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sco, Gideon, ed. 2021. *Drugs and Philippine Society*. Quezon City: Bughaw.
- McCoy, Alfred W. 2021. "Performative Violence and Philippine Populism." In Zucker, Eve Monique and Kierman, Ben eds. *Political Violence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1945: 59-7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Rafael, Vicente L. 2022. *The Sovereign Trickster: Death and Laughter in the Age of Dutert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Memory Politics in the Name of Redemption: Reading *Some People Need Killing: A Memoir of Murder in My Country*

Yi-yu Lai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o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amifications of the war on drugs during the Duterte administration (2016-2022) in the Philippines. It scrutinizes how the social dynamics and circumstances moulded by violence interact with ongoing discussions in Philippine society regarding memory, history,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s. Through analysing Patricia Evangelista's memoir *Some People Need Killing: A Memoir of Murder in My Country* (2023) alongside other relevant works, this paper aims to contextualize the depicted cases within the broader framework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Philippines. By doing so, it seeks to shed light on pivot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identify potential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words

Philippines, Duterte, political violence, war on drugs, memory politics
